

C h i n e s e F e e l i n g

中国体验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

Globaliz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of
Chinese Social Mentality

周晓虹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 h i n e s e F e e l i n g

中国体验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

Globaliz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of
Chinese Social Mentality

周晓虹 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
嬗变 / 周晓虹等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3

(现代社会学文库)

ISBN 978 - 7 - 5201 - 0286 - 5

I. ①中… II. ①周… III. ①社会心理 - 研究 - 中国
IV. ①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8589 号

· 现代社会学文库 ·

中国体验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

著 者 / 周晓虹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杨 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编辑部(010)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7.5 字 数：451千字

版 次 /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286 - 5

定 价 / 8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获南京大学“985”三期改革型项目经费资助

《现代社会学文库·第二辑》

出版说明

199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筹划出版了《现代社会学文库》，希冀汇总中国社会学优秀作品，引介国外社会学优秀成果，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十多年过去了，这套文库初具规模，在社会学界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社会学从无到有，逐渐走向成熟，学术从业者的训练也逐步专门化，并有大批海外学子学成归来。在此，有必要在社会学面对中国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在学术从业者构成以及知识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重新组织一套社会学研究丛书，以推动中国社会学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十年来在社会学图书的出版方面着力甚多，陆续出版了多套社会学丛书，比如《清华社会学讲义》、《社会学教材教参方法系列》、《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中山大学社会学文库》、《民族与社会丛书》等，并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基地。在这种条件下，《现代社会学文库·第二辑》的取向将是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普遍推广的社会学讲义。这类讲义必有丰富的基础理论知识，以及鲜活的中国经验，必有对过往经验的反思以及基于实践的创新。二是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和理论专著。学者基于扎实的调查而形成的著作是重点。此类著作当

有深刻的理论思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范本。

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产生了丰富的中国经验。社会学学者当能生产出更加丰富的知识，才能无愧于这个我们身在其中的伟大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愿以微薄的力量参与其中。愿此套文库的出版能够对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作一份贡献，也愿与社会学界的朋友一道，共同推动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社会新成长阶段的更大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中于北京华龙大厦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体验：精神嬗变的观景之窗·····	1
一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	2
二	中国人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嬗变轨迹·····	4
三	边缘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群像·····	8
四	中国体验的独特意义与普适价值·····	13
五	理解变迁，或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17
第二章	传统中国人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	24
一	传统中国人的日常伦理生活与意义世界·····	24
二	从臣民心理到国民意识：历史转型中的身份认同·····	28
三	从黜奢崇俭到消费实践：社会变迁中的生活方式·····	34
四	传统与现代性：中国人价值观的现代转换·····	39
第三章	中国人价值观的当代变迁·····	44
一	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守、变迁与当代转型·····	45
二	西方价值观念的流行、冲突与本土适应·····	52
三	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引导与变化·····	59
四	多元与小众：主流价值观念的分化·····	64

五	凝聚，或形成一个新的价值共识	69
第四章	中国人的幸福感	73
一	解读幸福的维度：个体、社会与变迁	74
二	从苦中作乐到物质追求：第一次嬗变	78
三	从个体感受到指标量化：第二次嬗变	84
四	“话语”与“失语”：当代幸福感与幸福观	89
五	幸福体验三十年：解读改革开放的一种视角	93
第五章	转型中的消费行为、观念变迁与社会体验	96
一	消费主义形成的动力机制	97
二	消费观念：演进·迭代·反哺	99
三	消费行为：符码化·全球化·两栖化	106
四	消费体验：动力·位置·重塑	113
五	共生：一种新的消费文化的崛起	121
第六章	情感与人际关系的新趋势	124
一	从激情到利益：集体情感基调的转变	125
二	从嫉妒到怨恨：社会情绪氛围的转变	127
三	从“单相思”到“一夜情”：亲密关系的转型	134
四	“加为好友”，抑或“一起孤独”？	138
五	无情抑或有爱？个体化的趋势与社会性的重构	142
第七章	信任：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147
一	何为信任，信任何为？	148
二	作为中国问题的信任危机	157
三	信任的转向：从“亲而信”到“利相关”	160
四	通过信任重建社会	163
第八章	从有线广播到移动终端：传播心理的嬗变	168
一	媒介变迁与中国人现代性的增长	169

二	互联网的兴盛：阅听人是如何卷入的	172
三	网络依赖与人际疏离	180
四	网络群体性事件：民意宣泄与社会监督	185
五	媒介共享，或“中国梦”的塑造	197
第九章	代际关系的再变动	200
一	从革命“接班人”到家庭“小皇帝”	201
二	社会转型与价值变迁：代际变动的双重视角	206
三	望子成龙与“孝而不顺”：两代人的“推手”	210
四	从“代沟”到“代差”：借道“文化反哺”	215
五	理解与尊重，或成代际关系发展新走向	219
第十章	情爱的嬗变	225
一	婚姻自由：女性解放和“政治第一”	225
二	赋权爱情：从《庐山恋》到《一个冬天的童话》	230
三	择偶观的变迁：“高富帅”和“白富美”	237
四	爱情的变奏：都市“剩女”和乡村“剩男”	241
第十一章	压抑与放纵：中国人性观念的变迁	247
一	中国人的传统性爱观念	248
二	浪漫之爱：20世纪80年代性爱观念的启蒙	253
三	市场逻辑的介入：性观念的商品化	259
四	传播媒介与性观念话语的变迁	266
第十二章	阶级意识的消弭与重生	275
一	亲不亲，阶级分：政治想象中的阶级营垒	276
二	“先富”与“仇富”：阶层差别的拉大与阶级意识的重生	281
三	底层社会的固化与草根阶层攀升的“天花板”	294
四	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沉沦：中产阶层的焦虑与疲惫	300

第十三章 集体行动的逻辑	306
一 集体主义时代的集体行动	308
二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和去政治化	312
三 个体化时代的大众行为：时尚、谣言与恐慌	316
四 个体化时代的集体抗争：“群体性事件”	325
第十四章 公民意识与社会参与感	332
一 从人民到公民：无意识的建构	332
二 公民视角下的社会参与嬗变	337
三 参与式治理：公民意识孕育的路径依赖	341
四 公民意识与乡村治理	346
五 公民意识与人的现代化	349
第十五章 面向未来，或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塑	354
一 中国体验：现实抑或虚幻？	355
二 从只此一地到只此一次：中国体验的独特意义	361
三 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变化的新趋势	366
四 走向，或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塑	374
参考文献	381
汉英人名对照	423
后 记	430

第一章 中国体验：精神 嬗变的观景之窗

自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以来，这 200 年来无数的学者以解释社会变迁及其动因作为自己毕生的志业。人们发现，刷新历史的力量是多重的，从经济增长、自然环境、技术创新、文化交融一直到个人尤其是那些精英人物的主观努力。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种社会研究的路径，就有多少种描述社会变迁的方式。费根揣测，气候的变化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比如玛雅文明的消失就与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旱灾有关（费根，2009：128 ~ 147）；丹尼尔·贝尔认为，“技术从来就是区分社会时代的主要力量之一”（Bell，1999：188）；亨廷顿提出，变迁是由包括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物质在内的文化间的冲突和交融促成的（亨廷顿，2010：51）；帕累托猜想，人类变迁的历史是“狮子”和“狐狸”两类精英循环的历史（Pareto，1968）；我们熟知的马克思则深信，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形态的变更是社会变迁最为严肃的主题。

正是鉴于变迁及其相关思考与现代社会科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天然联系，近年来我们一再指出，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转换为学术（周晓虹，2010a，2010b），否则就会像黄万盛、刘涛所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黄万盛、刘涛，2009）。近 10 年来，围绕上述学术转换，已经有诸多学者一再论及“中国经验”及

其意义（樊纲，2005；李培林，2007，2008；温铁军，2008），但事实上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总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观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迅疾变化。中国体验对中国人精神世界深度涉入，成为我们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观景之窗。

一 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角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2004年5月，雷默撰写了《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等特点。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崛起已经通过引进发展和实力的新概念而改变国际秩序”（雷默，2004）。

尽管雷默使用“北京共识”的意图非常明显，即用这一概念取代先前建立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或起码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确立另一种发展模式，但受到雷默启发的中国学者却相对谨慎，他们意识到“共识”应该是一种“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俞可平，2006：12），而中国的一切还远远谈不上是一种定型的并为世人广泛接受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选择使用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中国模式”所可能为人接受的表述是：它“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俞可平，2006：11）。

尽管“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本身无意与“华盛顿共识”等西方社会的发展概念分庭抗礼，但在对这一概念的具体使用过程中，还是引起了人们的疑虑。疑虑者提出，“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中国模式’还远未定型，中国将来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还存在隐性危机”，因此“现在讲‘中国模

式’还为时过早”（李克钦、史伟，2006）。虽然“疑虑”未必恰当，对“疑虑”提出批评的也大有人在，并且如郑杭生所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和转型，已经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显示出在全球的独一无二性，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郑杭生，2010），但疑虑确实是促成“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产生的基本原因。

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如李培林所总结的那样，大致包括：①它不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②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③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的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李培林，2007）。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不刻意寻求这一概念在内涵和特征上的差异性，我们觉得可以在相近的意义上混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再或“中国奇迹”等概念。

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多年急速变迁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迁及其结果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也自然构成了我们理解这场大变迁的双重视角。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

13 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

作为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庞大民族在这场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历练与心理体验，“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的内涵：①“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 30 多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②“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等，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等，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③“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④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适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石之瑜，2006）。

二 中国人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嬗变轨迹

历史是延续的，但不同的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的影响是不同的，这又使得人们的历史感是断续的。纵观近 30 多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过程，我们可以以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为里程碑，将这 30 多年来的嬗变粗略地划分为六大阶段。

传统价值观的断裂，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第一个阶段。造成中国传统价值观断裂的真正原因，是“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人

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历史大悲剧。这场悲剧不同于1840年后每每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所导致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次次动乱，因为它使中国人“痛定思痛”之余第一次有可能将“反思”从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移到自己文化肌肤的毒瘤之上。“事实上，只有这种‘不可推卸’的‘自我反省’，才可能产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文化批判，也才能造成几度欲断未断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真正断裂。”（周晓虹，1988）断裂首先出现在青年一代身上，因为这些怀着“解放全人类”崇高目标的一代率先投身于伟大领袖倡导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最先遭到了这场“大革命”的无情抛弃。因此，在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之际，他们即以“伤痕文学”的形式对整个十年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唤起了整个民族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①而且借助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力量，直接酿就了足以导致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发生断裂的巨大震颤。

传统价值观断裂的直接后果是价值观的空白状态，这是嬗变的第二个阶段。对扭曲、窒息、摧残人的灵魂和尊严的外在社会力量的批判，震塌了传统价值观这堵中国文化的“老墙”，也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暂时身陷于精神世界的荒原之中。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因旧的偶像破灭、新的人生目标尚未确立而产生的迷惘感和失落感。尽管这种迷惘感和失落感由于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所刊发的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以及其后主要由年轻人参加的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而被当时的人们理所应当地归结为年青一代的社会心态。但事实上，当时的年长一代在他们几乎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所遭受的空前劫难之前，其所感受到的迷惘和失落远甚于年青一代。

嬗变的第三个阶段是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萌生。催生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力量来自改革和开放两个方面。其一，就改革的力量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导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使得农村经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

^① “伤痕文学”的代表之一、作家刘心武在纪念“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死的100多个作家时，以一种深邃的目光追问道：“为什么在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昌盛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刘心武，1979）。这说明，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悲剧的思考已经深入我们的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

改革的任务。在这一基础上，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决定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二，就开放的力量而言，世界文明浪潮的波及、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仅使1984年的中国掀起了一场“现代化”的学习热潮，也使人们普遍经受了“全球意识”、“第三次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等现代观念的冲击。在改革和开放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在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中间开始萌生富有现代气息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他们开始渴望能够主动地介入而不再是被动地依附经济生活和社会事务，开始积极地从商、从政、从事任何自觉能够发挥个人才能和提高生存价值的工作，想名、想利、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留下自己的足迹。一时间，“深圳速度”、“步鑫生”、“‘傻子’年广久”、“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和“观念更新”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在文化与教育领域，“异化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文化热”以及“文凭热”也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不仅缓解了改革开放之初年长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和西方学术界长期隔离……跟不上他们在这30年里的变化”（费孝通，1985：279）而产生的“苦恼”，而且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和观念更新。进一步地，在沿海开放城市，年青一代甚至开始同一些陈旧的观念展开直接的交锋。比如，1988年，蛇口、深圳和北京等地的青年就公开对当时几位知名的“青年导师”的作用表示怀疑，并对他们所宣扬的价值观念提出了异议。

嬗变的第四个阶段是顿挫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必然结果。在新价值观开始萌生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矫枉过正的危險，因为传统的价值观虽然已经发生颠覆性的断裂，但孕育全新价值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完全形成，而拂面而来的改革开放之风却使相当多的人开始变得浮躁。加之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诸多新事物泥沙俱下，它们既可能使一群人兴奋，也可能使另一群人不满。比如，社会政策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经济上的“双轨制”则为部分权势阶层先富起来创造了条件。这样，在“相对剥夺”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许多人的社会心理天平失衡了。到了80年代末期，整个社会竟形成了一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复杂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形成了结构性的张力，而一些突发事件则成了1989年“六四”

政治风波的导火索。在自此之后的三年顿挫期中，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转变不但停顿下来，而且陷入了新的迷惘和困惑之中。

接下来的第五个阶段可以称作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复苏阶段，它的标志十分清晰，就是邓小平 1992 年 2 月的“南方讲话”。在此之前，作为“六四风波”的对应物，中国社会再度出现了“左”的思想潮流。有人认为，这场风波是阶级斗争的最大反映，因此反和平演变是当务之急；也有人认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孕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土壤，而“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坚持搞经济建设，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不但稳定了人心，更重要的是引发了随后而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热潮。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并通过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固定下来。至此，市场经济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不可遏止地奔腾开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重新进入复苏阶段，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心态孕育而生。

不要低估 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冲击。美国《时代》周刊曾数次将邓小平的头像刊登在其封面上。1979 年，当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时，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 180 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而 1992 年的南方旅行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文章写的则是“航空母舰”在 13 年里的第二圈（李海鹏，1997）。从 1992 年开始，这第二圈走了 5 年。1994 年，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市场经济的热潮深刻地影响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当年度我们完成的流行语评选中，“下海”、“炒股”、“申办奥运”、“第二职业”、“大哥大”、“大款”、“发烧友”、“发”、“打的”和“老板”名列前 10 位，充分显示了 1992 年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景况（周晓虹，1995）；而郑杭生、郭星华同期完成的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呈现多元化的趋向、代际差异变得更为明显、隐私权开始受到尊重、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变得愈加宽容，但在人们旧有的道德观发生裂变的同时，全新而清晰的道德观尚未形成（郑杭生、郭星华，1995）。

最后，我们以 1997 年为界，将其后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划